

◎作家近况

# 祝勇：用文字搭座紫禁城

柏玉美 张鹏禹

作为一名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和故宫文化的普及者，祝勇近年来持续书写着故宫掌故与传奇，以个人化视角展示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祝勇推出非虚构新作《故宫六百年》。他说：“我想用文字搭建起一座紫禁城。”

在书中，祝勇带领读者，打开一扇扇大门，跨过一道道门楣，在金銮宝殿、亭台楼阁间抚今追昔，在600年历史风云间徘徊流连，体验了一次时空穿越之旅。

## 写出这凝聚文明之美的城池

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如何表现这庞大的主题？祝勇希望通过轻灵的文字来撬动它。书中，他采用比编年史更亲切、熨帖的叙事结构：通过午门、太和殿、神武门等建筑空间来展现故宫10个甲子的过往云烟。

在祝勇眼中，紫禁城首先是一座建筑，然后才是它的历史：“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也是通过空间获得的。我在书中把故宫分割成若干建筑空间，并为它们选取一个代表性的时间片段，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我从午门这一故宫的正门开始讲起，写朱棣时代宫殿的营造，随着空间与时间的推移，写到神武门时，讲的是薄仪1924年从这里离开，由此形成了历史的闭环。读者阅读也伴随着从午门进，从神武门出，和现在的参观路线相同。”

从《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旧宫殿》《血朝廷》到新作《故宫六百年》，祝勇书写故宫的一系列作品中，故宫人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祝勇说：“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事件，而是事件中的人。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是由人完成的，所以核心永远是人。”

大众熟知的，多是故宫里帝王将相、后宫嫔妃的故事。然而在《故宫六百年》中，祝勇着墨颇多的是故宫里更广大的芸芸众生：从太医、工匠，到太监、宫女，这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人，也被作者视为构成紫禁城600年丰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祝勇说：“从为保护太子而献出生命的太监张敏，到以杨金英为首谋害嘉靖皇帝的十几名宫女，这些卑微的小人物，甚至影响到历史的走向。”

在书中，作家尽可能地展现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祝勇笔下的人物更多是利他的、利群的。紫禁城不仅有影视剧和通俗小说里的权术、阴谋、党争、官斗，更有着日常生活的

坚实质地，有着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甚至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写的历史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历史，有人的温度，人的血色。”祝勇认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

## 搭建普及文化的“金水桥”

除了作家、学者，祝勇还有多重身份，他主编过《布老虎散文》等多部丛书，他是《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和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的总导演。从这些身份不难发现，祝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他写《故宫六百年》正是想搭建一座将故宫和大众连接在一起的文化“金水桥”。

在写作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敬畏之心，酝酿良久方肯落笔。作家惊奇地发现，纸上“建房子”的3年多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营建紫禁城的用时相近，让祝勇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更真切体验。爬梳史料、考稽典章时，祝勇发现，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时，故宫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在这样的博弈中，它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这或许埋藏着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密码。在书写故宫的同类型文学作品中，祝勇的《故宫六百年》于历史、建筑、人物外，更寄寓了作家对中华文明的省视与哲思。作家王蒙评价说：“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祝勇说：“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故宫的书，着眼的都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大家会很奇怪，苏东坡是宋代的，为什么要到故宫寻找他？实际上，故宫收藏了苏东坡的墨稿、他的一些书法作品，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黄庭坚的作品。”他笔下的故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意义上历代王朝的故宫，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后者显然更重要。

“虽然书名叫做《故宫六百年》，但其中囊括的内容不止600年。比如，1420年朱棣为什么建紫禁城？为什么要定都北京？书里都有涉及。此外我还意在通过故宫展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文物，浓缩了5000年文明，回望故宫，目光要超过600年。”祝勇说。

作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除了用文字传递故宫文化外，祝勇也尝试用影视手法展现故宫之美。他目前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对于“故宫”通过各种短视频、小程序和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网红”，祝勇认为，用哪种形式传播故宫文化，严肃或者轻松，网络还是纸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传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说：“历朝历代，中华文明都强调仁爱、信义、牺牲、宽容等价值观，它不会随着王朝更替而变化，这些正是我们传播故宫文化时需要弘扬的。”



祝勇近照

## 赓续文脉传薪火

在《故宫六百年》中，祝勇写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流失被毁的灾厄，也写到故宫文物南迁颠沛流离的过程，更写到保护遗产、赓续文脉的一代代人。在《一座书城》一章中，祝勇用文字纪念了晚清民间文人守护文脉的义举：面对散失了3/4内容的《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杭州丁氏兄弟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官方发动、全凭文人自发进行的一次抄书活动，他们如女娲补天一般，经过7年努力，使得文澜阁“琳琅巨籍，几复旧观”。书中最后一章，作者介绍了一位在故宫工作多年的老前辈——庄严先生。他一身长衫，瘦削温静，在抗战时期为保全故宫文物，使其躲避战火，带着故宫文物南迁，以“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使国宝免于兵燹，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第二任院长马衡先生，以及一代代工作人员，像那志良先生、单士元先生，为保护中国的文化命脉，前赴后继，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祝勇说。

在故宫博物院创建之前，第一代故宫守护者就不辞辛苦，将文物清点登记造册。故宫人不怕打击，忍辱负重，在文物南迁过程中，易培基被卷入盗宝冤案，在他含冤去世后，故宫人并没有受此影响，仍旧前赴后继，完成了文物南迁伟业。

“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文物高于个人生命的精神代代相传，故宫前辈们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倾尽毕生心血，乃至生命。这种精神力量感召着我们，也鼓舞着我们。”祝勇动情地说。

# 传记文学如何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在今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相比其他门类，以记录时代精神为己任的传记文学，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进一步总结科学家传记创作与研究经验，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家传记创作现状及其得失”学术论坛在京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作家、出版人就相关话题展开了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科学家传记创作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作为传记文学的一个分支，“科学家传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创作热潮，近20年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数量有数千部之多。另一方面，传记文学创作也存在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急就章多，缺乏精耕细作的水磨工夫；传记作者对科学工作不了解，高水平作者缺乏；传主选择面窄，只关注著名科学家等问题。弘扬科学家精神，是时代赋予传记文学的使命，要进一步拓展科学家传记写作的思想艺术空间，加强作者队伍建设，健全理论评论体系。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展认为，当前中国传记文学创作形成了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科学家传、外国科学家传和科学家影视传记四股创作潮流。在弘扬科学家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等方面，郭久麟的《袁隆平传》、桑逢康的《吴孟超》、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徐光康的《蒋新松》、叶依的《你好，钟南山》、徐鲁的《屠呦呦》等作品为科学家传记写作提供了典型范本。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为，科学家的一生与众不同，在生命生活外，还具有“科学人生”的历程。每位科学家又拥有三个世界，包括现实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科学家传记相比其他人物传记，在写作对象、主题立意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靳日从中国科学家传记的源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入手，分析了司马迁在写作中运用的多元叙事策略。她认为，科学家传记写作要想抵达读者，需要在叙事手法上深入开掘。《史记》在2000多年前已将春秋时期名医扁鹊和汉代名医淳于意的形象塑造得“有骨肉、有血脉、有情怀”，留给后人无尽启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认为，要进一步厘清“科学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拓展科学家传记取材范围，注重为社会科学家和从事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立传。

成立于2020年1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目前已在传记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传记文献整理、传记批评、传记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未来将致力于学术前沿问题跟踪、研究，为中国传记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 刘庆邦中短篇小说集《心事》出版

本报电（韩一）10月17日，以“生活大雾，爱就是能见度”为主题的刘庆邦新书《心事》发布会在北京雍和书院举行。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家刘庆邦在40余年的写作历程中创作的22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故事背景以矿工生活和农民生活为主。作品文笔流畅朴实，情绪表达细腻，从客观平视的视角展现了男女主人公遭遇爱情时的内心世界。

刘庆邦认为，与自己以往强调小说的反思功能不同，《心事》着重于生活中的爱，突出小说的审美功能。他说：“生活是矿井，爱是矿灯。爱的本质是善良、尊重和付出。爱也是一种天赋、能力和意志力，人对真正的爱总是保持着敬畏感。”

##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首发

本报电（柏玉美）近日，《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书作者张莉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论著。作者张莉通过爬梳史料，带领读者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研究，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

张莉认为，研究者需要关注这些女性写作者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可能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属于那一代中国女性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

## 荆永鸣小说分享会在京举行

本报电（胡雪慧）10月23日，由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杂志社和北京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异乡人的北京——荆永鸣小说分享会”在北京市作协举行。十余位作家、评论家以及荆永鸣作品责任编辑和好友出席活动，缅怀作家荆永鸣，并从不同角度就其“外地人”系列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独特魅力展开讨论。

专家认为，荆永鸣的《外地人》《北京候鸟》《北京邻居》《北京时间》等小说，是当代京味文学的重要收获，也是对京味小说的重要拓展。作家对外地人在北京的奋斗和艰辛，有切身感受，因此这些作品既有充沛动人的情感，也饱含着对他们生存境遇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荆永鸣1958年生于内蒙赤峰，2019年因病逝世，曾获人民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创作“乌金奖”等。1997年，年近不惑的他离乡到北京开餐馆，并于两年后以餐馆为原点开始小说创作。20年来，荆永鸣以异乡人的视角观察底层北漂人群，塑造了一批“北京候鸟”的形象，对他们生存境遇和命运进行思考。

## 《心居》讲述沪上烟火人生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日，“沪上味道与人间烟火——《心居》新书分享会”在上海思南公馆举行。

《心居》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新作，讲述了在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上海，以顾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上海人，围绕房子衍生出的种种悲欢交集的人生经历，塑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常驻者、折腾半辈子只为落叶归根的老上海人、初来乍到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等形形色色的城市人，他们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同样也不遗余力地为心灵寻找安放之处。小说不疾不徐、细腻软糯的行文风格，或许正是“沪上味道”地道的注脚——这座城市和城中人不失温热的精明、无害的野心以及烟火人间烟火的黏帖。

活动现场，滕肖澜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她说，我没有详细写买房、卖房的过程，而是意在表现房子对不同家庭、不同阶层的影响。房子对上海人的意义远不止一个住所，房价的上涨，多少会撼动上海人原有的价值观，进而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都觉得真实，而不是人们想象中似是而非的上海。

上海作协副主席薛舒评价说：“《心居》虽然以房子为切入点，但更多是揭示了新上海人生活的困境。在滕肖澜的故事里，每一个角色都是生活家，他们会用最通俗的语言说出市民真理，用市民的话表达市民的追求、市民的哲学。小说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小情绪，当生活中的意外出现，小说人物依然在用他们的人之常情去面对那些曲折、挫折，这是滕肖澜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特别之处。”

滕肖澜说：“《心居》写的是上海，更是上海人。虽然是小日子，过的却是大味道。小人物亦是主人公，有妥协中的抗争，狭隘里的伟大。”

## 《克罗地亚现代诗歌选集》首发

本报电（文一）《克罗地亚现代诗歌选集》中文版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该书收录了由克罗地亚作协编选的60多位克罗地亚诗人近30年来的代表作，通过中国作协译介资助计划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在致辞中指出，《克罗地亚现代诗歌选集》是中国作协与克罗地亚作协作品互译项目的重要成果，这本书使中国读者有机会通过克罗地亚现代诗歌了解克罗地亚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 ◎新作评介

# 诗歌是什么，诗人是什么

——谈谈李瑾《谭诗录》的文学目标

邱华栋

中国当代诗人在诗学意义上的深度沉思结为文集的并不常见，因此读到李瑾的《谭诗录》时，我有一种极大的惊喜。在这部沉思录式的诗学谈话中，李瑾以某种我们早已陌生的先秦诸子的思考方式和古希腊哲人探源世界般的诘问与回答，具体而犀利地探讨了诗歌与乌托邦、世俗化、思维、价值、空间、时间、自媒体、启蒙等50个核心词汇之间的关系。宏阔的视野，深度的思索和凝视，是这本书的价值。50个词似乎很宏大，但又非常具体地关乎诗歌本质。他在努力表明，当代诗歌走向未来，有着多种面向和无数可能。他给我们指出了很多条小径，它们最终将成为通往罗马和长安的大道，为每一位诗人所记取。

文学皆人学。就诗歌而言，它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这样一种哲学——通过张扬语言去重新理解和定义人，这点已为启蒙视野中的诗歌史证实。当我们在自我吟咏并心怀远方时，是否有这样一个疑问，人为何会失去自己呢？哲学上的解释是，如果把人的目的简单归结为某种外部的客观现实或超验的客观必然性，结果会使人在外部现实和内部生活中失去自我。李瑾是在对自我的寻找中重新定义人乃至诗歌的，他谈论诗歌的一个基点是将诗歌界定为一个人的事情。这点并不奇怪，哲学家海德格尔即说诗歌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语言不过是作为寂静的音说话。诗人里尔克也指出，诗歌是在“走向内心”。

李瑾眼里的诗歌即是作者“自己”：“诗歌此在个体本身，是个体之‘我’察觉世界的情感悸动和隐秘体验。诗歌只具有时间性而不具有空间性，情感的流动乃一维的，它发生在创作之前，一旦发生位移，固化为肉体性文本，被他人感知，诗歌就失去了‘本来’。因为个人的情感在发生时就已经完成，文本乃‘第二性’的。”据此，他推导出对诗歌内涵的如下描述：“诗歌为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旦创作完成，就不再是诗歌。”李瑾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他是从人的内在本性角度来把握诗歌的本质的，当然这也是人自身的本质。在李瑾看来，“诗歌本来是不可说的，对这样一种沉思性思维，本不可以轻易置喙而需保持沉默，诗人更当如此。因为一旦说出/写出，内在于我的差异性就消失了”，这种见解无疑会将诗人和人真正等同起来，因为诗歌产生于“我”的身份认同遭到严重威胁之际，亦即诗歌的出现或书写不是文化事件，

而是精神事件，诗歌是在自我发现和认同中建立起来的“我”的替代品。

不过，李瑾在重新理解诗歌时，并没有陷入绝对个人主义的泥潭，他要做的是重建价值主体，即试图通过挖掘诗歌的启蒙意义，恢复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性和尊严。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这个社会是网络状的、系统性的，人不是完全个体性或绝对自由化存在的，而是劳动性的客观实在，这点显然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即把诗歌这类文学活动“当作人的感性行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李瑾认为：“诗歌是内在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这个意义上，内在自我是他者自我，他者是个我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话。”毫无疑问，在他的视野中，一方面诗歌是动态的主我的集中体现，同时处于稳定和变化、统一和多元、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而交融的逻辑体系中，另一方面，在诗歌建立起来的平台上，诸多自我有对话/吟咏的质性或可能。

有意思的是，李瑾在《谭诗录》导言中并不以“诗人”自居。在他看来，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使内在自我的敞开成为可能。“敞开”，显然已经超越文学视域了。也就是说，李瑾对“诗人”这个称呼的否定恰恰是一种肯定：诗歌是动态的多元性系统，她潜在地包含哲学或逻辑上的一切可能，甚至还是自我的对话。这样一来，“诗人”就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价值和导向。当分行成为新诗的唯一规定性，人人怀有对新诗的一套认知、理解，且洋洋自得，并以自由为名拒绝评判时，自称“诗人”显然是对诗歌的一种冒犯或亵渎，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不是别的，而是抵御世俗、避免自堕的伟大的精神力量。

《谭诗录》的阅读非常愉快，闪电般的思维在网状结构中均匀分布，文体的简洁和文字的闪耀，让我们看到了智性的露珠。这本书表达了李瑾对诗歌、诗人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从社会和个人共同形成的场域中重建诗歌内涵和外延的努力。这是一本被智性思索提升为明灯高地的诗学著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